



以“新四化”激活供求两端

——专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

未来改革改什么，创新创什么？要落到“新四化”。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近日，《英大金融》专访了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请他就2022年我国如何应对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实现稳中求进畅谈观点。

黄剑辉提出，要加快经济理论创新，以“新四化”激活供求两端的宏观思考，即要素市场化、全面数字化、经济低碳化、民生富裕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

加快理论创新，改善市场预期

《英大金融》：您所在的民生银行一直以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为重点，您本人最近又当选为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从您的视角分析，我国民营经济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黄剑辉：正如大家已经确知的，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为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局面下，民营经济可谓首当其冲。

受到贸易战负面影响，很多企业搬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影响了我国国内就业，收入预期不行，需求必然收缩；疫情因素导致生产端、供应链受到影响，供给受到冲击，部分民企倒闭也是一种供给收缩；预期转弱，投资欲望降低，这是市场的共识。

2021年，摆在中国民营企业面前的是疫情反复、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部分企业同时面临的经营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增加、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疫情的冲击使总需求迅速下降，需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民营企业大多属于服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原副院长，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著有《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济学原理》《中国关键：提升经济竞争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战略与路径：迈向 2049 的中国》《迈向 2049 的甘肃——超常规发展的战略思维》《迈向 2049 年的吉林：强化市场、开放包容的战略思维》等。

务业，其中餐饮、娱乐、商场、百货、旅游、运输、教育等行业所受冲击尤其明显。制造业也同样受到了冲击。随着全球化的深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全球供应链不断扩展、深度交织，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产生“蝴蝶效应”。民营企业大都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由于疫情在世界多国蔓延，不少企业受国外合作方影响被迫停工停产，资金回笼也成了大问题。

《英大金融》：面对“三重压力”的现状，您认为应当如何破局？

黄剑辉：经济理论在寻找驱动经济增长源头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可以从“斯密增长”“熊彼特增长”“奥尔森增长”三种经济增长模型说起。

第一阶段，从经济增长的源头分析，斯密增长就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积累，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只要把生产要素集中于那些最具优势的对象，那么仅仅由于要素的重新配置或流动，就可以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应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直至 90 年代初，类似“要想富先修路”的政策导向，就产生了基于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或商品贸易收益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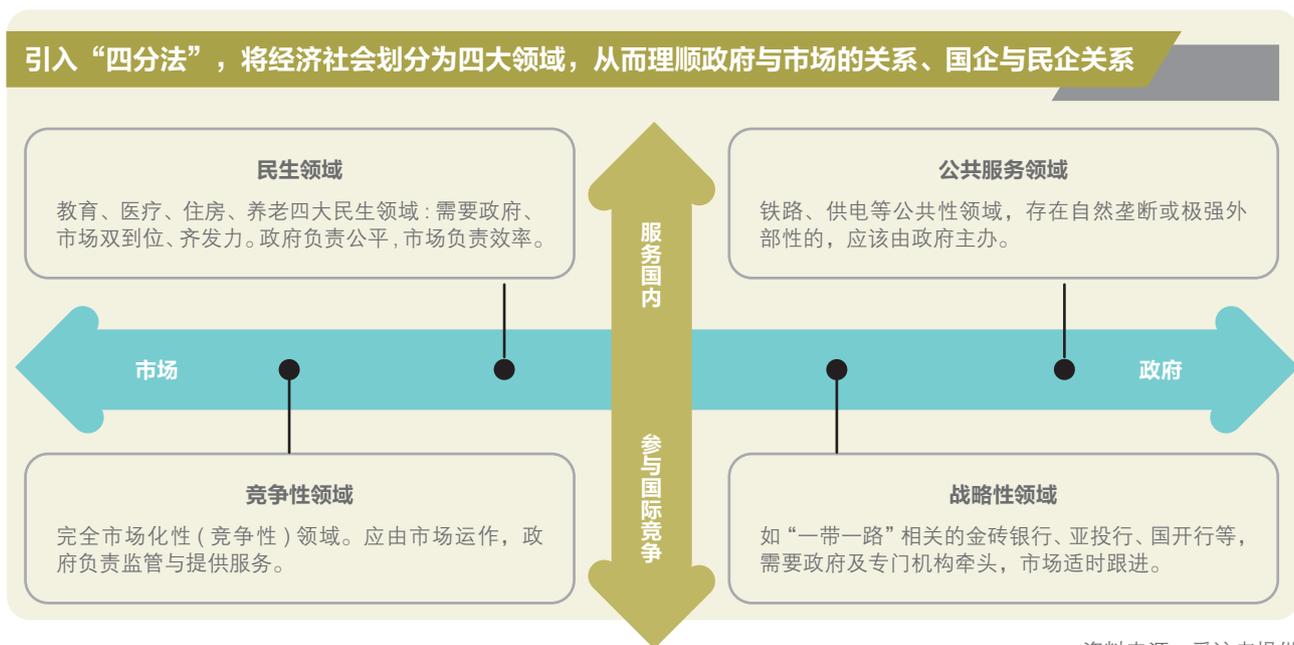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来自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中国以互联网等科技创新为抓手获取了新的增长动能，这就是熊彼特增长驱动。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讨论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其中包括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创新，并特别突出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发展到今天，更需要源于制度创新驱动的增长即奥尔森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对国家（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强化市场型政府”，并指出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财产权利、维护契约，同时促使承担这项功能的政府最有效和最公正地完成自身使命。适宜制度的特征表现在为社会提供一套好的激励机制，帮助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稳定预期，进而降低交易成本。

在此基础上，我将经济社会划分为四大领域，从而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企与民企关系。

引入“四分法”落地“新四化”

《英大金融》：这是否意味着，“制度”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政



> 资料来源：受访者提供

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焦点，也是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难点，请您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框架的原理。

黄剑辉：我把涉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分成四个领域。

第一个是战略性领域。例如国家开发银行，我建议归类由目前的政策性银行调整为战略性银行。因为“政策性”这个词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低效率补贴的内涵，而战略性银行主要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同时是保本微利的，必须由国家创办、国家主导。以此类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金砖银行、亚投行等，需要政府及专门机构牵头，市场适时跟进，也应当属

于此列。

第二个为公共服务领域。铁路、电力等公共性领域，由于存在自然垄断或极强外部性，应该由政府主办。如果按供求关系来确定公共领域产品的价格，就可以赚取垄断利润，但民众的痛苦指数会很高，因此需要由国家制定合理的价格。

第三个是民生领域。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四大民生领域，需要政府、市场双到位、齐发力。以医疗为例，既要有政府主办的公立医疗机构提供面向大众的基本、保底医疗服务，又可以由私立医院提供优质高价的医疗服务作为补充，从而实现府负责公平，市场负责效率。

第四个为竞争性领域，即完全市场化（竞

竞争性)领域,应由市场运作,政府负责监管与提供服务。

这套理论框架我已经开始应用于实践,例如结合京津冀协同战略,缩小南北差异;也根据吉林的情况做了《迈向 2049 年的吉林:强化市场、开放包容的战略思维》发展报告等等。

《英大金融》:理论创新框架最关键的是如何落地。近期,您在中国民营经济 50 人会议上就应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发表主题演讲,提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人民经济”;要加快“新四化”,即要素市场化、全面数字化、经济低碳化、民生富裕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具体应当如何理解?

黄剑辉:未来改革改什么,创新创什么?要落到“新四化”。

第一个是“生产力要素的市场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曾对我们谈到,1989 年的莫干山会议主要解决了双轨制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商品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但是生产力要素远未实现市场化——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技术都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还要特别加上“企业家”这个要素,因为要以企业家要素引领和整合其他要素。

改革各种制约要素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化解行政性垄断、不合理管制,减少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扭曲,扩大开放降低准入门槛,充分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降低基础性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此来持续、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个是“全面数字化”。每个时代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与技术替代都有关系。人类文明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过去 20 年的数字化进程已经度过了衣食住行的四个阶段。接下来将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数字技术,并深入到生产甚至学术等各个方面。

要加快新四化,即要素市场化、全面数字化、经济低碳化、民生富裕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

链等数字技术,并深入到生产甚至学术等各个方面。

第三个是“经济低碳化”,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才能顺利实现。具体而言,需要从三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能源供应方面,尽可能用非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发电、制氢,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二是能源消费方面,力争在居民生活、交通、工业、农业、建筑等绝大多数领域中,实现清洁电力、氢能、地热、太阳能等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替代;三是人为固碳方面,通过生态建设、土壤固碳、碳捕集封存等组合工程去除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引导中国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同时也有必要集合政府、金融机构、零碳企业以及具有优势的其他机构共同支持碳中和目标的达成。

第四个是“民生富裕化”。有一个公式:共同富裕 = 共同发展 + 共享成果。建议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福利,包括大力改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交通。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办法,可以考虑在毕业生工作转正一年以后根据不同的城市提供基本的补贴额。对于中产家庭,所得税的税率始终要低于欧美日国家一个百分点,让全球的富人都能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消费等等。

总的来说,要素市场化就是“改革”,全球一体化就是“开放”,全面数字化是“创新”,“十四五”的三个要点,最终的目标是要落在人民生活的富裕化。下一步中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运用“空中飞跃,云中漫步”的思维。E